

中国人

域外
纪实

别在巴黎玩深沉 ——巴黎见闻录

巴黎街头艰辛备至的打工者
一位中国女留学生的绝望
一个老红卫兵在法国
著名的布隆涅森林色情业

徐刚 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

736
贵州省图书馆

登记证号(京)131号

中国人别在巴黎玩深沉

——巴黎见闻录——

徐刚 著

中国世界语出版社出版

(北京百万庄路24号 100037)

北苑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总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787×1092 1/16 6.5印张 200千字

1993年5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00001—50000册

ISBN 7-5052-0104-2/I·38

定价: 3.38元

一、女流浪汉和警察

这是一个重叠、交叉的梦，各种色块各种线条自由散乱地超常组合。富裕和贫困，圣洁和肮脏，美丽和丑陋一起，大摇大摆地从香雪里榭大街从蒙马特高地白教堂下从巴黎圣母院门前擦肩而过。

巴黎的冬季太漫长，下不完的冷雨，很少有雪。春天十分短暂，如同街头第一片梧桐树叶落下冬天便来到一样，桃花开的时候，就是夏天了。

只有夏天才更多地见到太阳，有阳光的日子流浪汉们便雀跃。

他们从巴黎的地底下——五百多个地铁车站、废弃的地下电车涵道和无名的洞窟里走出来，他们是无业游民、醉汉、大麻客、光头帮、画家。报载这些流浪者的数字已超过7000人，他们已成为巴黎的负担，但有人说这是巴黎的景观。

人们，尤其是法国人，像躲避瘟疫一样躲避这些流浪汉，随着经济衰退法国失业人数超过300万之后，流浪汉们得到施舍的机会已经微乎其微了。资料显示，在法国的外国移民中流落街头者还不到流浪者总数的百分之二，也就是说那些醉鬼那些大麻客那些乞讨者，基本上都是法国人。

他们中的有一些人，尤其是孤寡老人总是沉默的，掏着地铁站里的几个垃圾筒，希望能找到残剩的食物；有一些人则永远自言自语，充分地表现着法国人演说的天才；还有一些人则坐在候车的椅子上，面对着每一列进站、出站的列车破口大骂；甚至当着匆匆来去的人们解开裤子掏出那活儿“哗啦哗啦”地小便。天热的时候，地铁站里充斥着的是这一种骚臭混和着劣质香水的、使人不得不掩鼻的气味。

当电视和报纸把新闻的触角伸向他们，并且惊呼“巴黎不再是美的巴黎”时，密特朗总统语出惊人：如果没有了流浪汉和醉鬼，巴黎就会少一种景观，他们的存在不必大惊小怪。

密特朗不失风趣和大度，然而出乎意料的是，流浪汉们却并不感谢他。他们举着空酒瓶大叫：密特朗爷爷，你带着你的太太、情妇和狗以及地窖里的香槟跟我们一起睡地铁吧！

一个胖胖的头发很短头上长着几个大脓包的中年女人，和另外一个永远满面红光满嘴酒气的男人半搂半抱着，把营地从地铁站搬到了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在一个阳光炽热的九月的上午。

我刚好坐地铁去圣·米歇尔大街买颜料，等车时目睹了五个醉汉争夺这个中年女人的打斗，这是一伙都已被酒精烧得稀里糊涂的人。他们中意识稍稍清醒一点的，便是酒和女人，而一个还不是老态龙钟的女流浪汉又必须得依靠一个男人。醉汉们醉亦有道——有一瓶酒必定是你一口我一口地轮番享用，谁也不允许独吞。据法国的朋友讲这一点他们做得很够哥儿们义气，而面对女人那就一样了，于是便开打，歪歪斜斜地打，很少能击中目标的打。醉汉们的眼睛里一定是天旋地转，有稍为清醒一点或年轻一点的醉汉，略施拳脚便可把对手们轻而易举地打趴在地上。

那女人很得意，从地上捡了个烟屁股，喷云吐雾，不时地侧过头去看一眼，看结果出来没有。她夹烟的手指头是灰黑色的，两个指甲上还有指甲油的残红，残红只有一点点，她把手指头举起来，烟屁股快要燃尽了，她让别人看看她曾经染过指甲。

我远远地跟着他们，想看热闹，或者说我的心境跟他们更为接近一些。

那个酒鬼一到巴黎圣母院门口便走了。这个繁华地带的诱惑对醉汉来说是无法抗拒的，酒巴、咖啡巴，比比皆是，太阳伞下的游客们悠闲地举起手中的高脚杯，品尝着法国著名的葡萄酒，还有咖啡，浓郁的香味丝丝缕缕地飘来。

他去找酒去了。

她伸一个懒腰，坐在花圃的水泥石沿上，用十个手指头在头发里抓了几下，头屑、烂纸、烟灰纷纷飘落。然后用右手挤脸蛋左侧的一个脓包，再把脓水象油漆匠一样一层一层地抹在花圃的绿色栏杆上。在脓包挤出血水之后，她捡起地上的一张废纸撕一个小角用舌头一舔，贴到了那个脓包上。

她开始脱去上身唯一的一件外衣，目光四射地看一眼周围的游人，再用两只手托着她那硕大的两个乳房，抖动、揉搓，口中念念有词之后，便开始寻找衣服上的虱子或者臭虫，抓住一只就用牙齿咬得崩崩响，这一切都做得利落潇洒，法国人总是很潇洒的。

人类消灭虱子的办法差不多。

巴黎圣母院广场的另一端便是巴黎警察总局，当她消灭了最后一只虱子或者臭虫时，一男一女两个警察从她身后和气地说：“请你把衣服穿上，太太。”

巴黎的男女警察都很帅，屁股上一律挂着手枪、手铐、电棍。



她侧过脸冲着那位男警察笑了笑：“你应该先请我去洗个澡，然后我们上床。你要知道我已经一年没有洗澡了，只要好好洗一洗，一切都不坏，你信不信？”

警察正色：“太太，我是在执行公务。”

“我明白，我等你下班，我有的是时间，OK？”

两个警察几乎是同时耸耸肩膀，又几乎是同时伸出了一只手：“请！”

“请我去哪儿？说，说呀！请我去哪儿？我的丈夫让一个小娘子拐走了，我把两个儿子养大之后，他们有了自己的女人，你知道吗？女人，象蛇一样缠住他们的女人，一年换几个，再也想不起还有我这个妈。我找丈夫找儿子，什么也没有找到，失业，交不出房租，我给轰了出来。我已经有三年没有去度假了，鹅肝酱和海鲜色拉真好吃，我去哪儿？地铁？我住得满身都是疮，你看见吗？我需要阳光，和你一样我需要阳光，我是法国人，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能在法国的土地上享受一下阳光？你们收留了多少外国难民？非洲人、斯拉夫人、阿尔巴尼亚人、犹太人、中国人，你去看看地图，中国有多大？法国有多大？那么多的中国人到法国来干什么？他们有房住有面包吃开餐馆发财，我们就该住地铁？还有你们这些警察，看见富人的狗恨不得喊一声亲爱的再舔舔屁股，你看见没有？虚伪笼罩着法兰西！塞纳河已经浑浊了，卢浮宫也快吃完了，巴黎圣母院的那个敲钟人早死了！只有阳光是真实的，请走开，我要躺下晒太阳了，也许我还会脱裤子，我的裤子里好象也有几只虱子，对了，你们警察局有蟑螂吗？我原先住的房子至少有三万只蟑螂，巴黎被蟑螂占领了，谁占领巴黎都行，反正我们法国人喜欢投降，我现在要睡觉。”

她睡着了。

她真的睡着了。

两个法国小女孩小心翼翼地把她的上衣拉平盖住了她的上身。

阳光很好。巴黎在经过漫长的阴雨寒冷之后，总算有了阳光，法国人喜欢阳光和艺术，是的，她为什么不能享受这真实的阳光？

二、法兰西面对 不可思议的中国人

你不能不承认，她说的太体是实话。

她身上既然有虱子，就不能不提。

流浪汉捉自己身上的虱子，和警察提着手枪抓凶犯，有多少本质上的差别？

一个人在一无所有之后，他的抗议也是赤裸裸的，并且会妙语连珠。虚伪与客套是上流社会的特产，只有酒鬼才说得出口：“让我再醉一回，我就死。”

一般来说法国社会是比较宽容的，即便是非法移民只要进入法国以后不作奸犯科，被赶出去的可能性较之于美国、德国要小得多，这大概就是你在巴黎街头会看见那么多的阿拉伯人、黑人、中国人的原因之一了。一个社会的宽容度又往往是和它的富裕程度成正比的，在法国连续四五年经济不景气，失业人数已超过300万人之后，移民问题开始成为政党竞选的话题，和实实在在的社会问题。法国极右派头目勒彭的口号是：法国是法国人的，把移民赶出法国去！

勒彭会上台吗？

甭管勒彭会不会上台，就连一般的不具有明显政党倾向的法国人，也开始越来越把注意力投向中国人，他们怎么也弄不明白眼看着刚来法国时一文不名的有一些中国人，却在三五年之后有了自己的外卖店、杂货铺，甚至是一家有门有脸挂着红灯笼供着财神爷的中国饭馆。尽管法国人在内心里最讨厌的是阿拉伯人，而在行动上表现出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人。

也许对法国人来说，最不能容忍的是这些中国人居然不学法语——全世界最高贵的语言——他们除了说几句发音绝不正确而又保证你能听懂的生硬用语外，不再多说一句。他们赚法国人的钱，他们生活在中国人的圈子里，或者说只要有一个中国人的圈子便是一个中国的小社会：说中国话、吃中国饭、墙上贴的是中国山水画、门口供的是中国财神、烧的是中国的香、收音机里放的是中国的歌曲，从《刘三姐》、《闪闪的红星》直到《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

“中国人来法国干什么？”

不仅是法国人，中国人自己也在问自己。

通常的回答是：“有病，我们全有病！”

“吃错药了！”

更年轻一些的人则认为“法国自由，没有那么多的约束。”刚到巴黎的中国人几乎都有这种感慨：“法国太美了，太自由了！”然而，如果你不是一个匆匆来去的游客，而要在巴黎生活下去，要租房，要设法挣钱，要面对着每个月纷至沓来的各种账单，就会觉得后背直冒凉气，生活的压力太沉重

了。

“自由”，实在是一个迷人的字眼，人世间没有绝对的自由不说，在相对的自由中至少有一部分是和金钱互为因果互相陪衬的。

的确，在法国有太多的自由——

你有买地产买葡萄园的自由，假如你有足够的钱。

你随意去旅游，飞机票、火车票都不难买到，你有钱吗？南部尼斯海岸——世界著名的蔚蓝色海岸正在向你招手。

进赌城也很自由，只要穿上西装打上领带就行。

法国是名牌的世界，名车，名表，名服，名鞋，每个季节都会推出名牌，所有的名牌只对有钱人微笑。

呼吸空气的自由，晒太阳的自由当然人人都有，但也有差别：如果你去枫丹白露看拿破仑行宫在森林草地上散步，作深呼吸，你此时享受到的新鲜空气是带着自然的芳香与润湿的，你的鼻子里会感到甜蜜。

在巴黎也可以晒太阳，可是法国人一到夏天便发疯一般出去度假，哪怕度假归来就把房子、汽车抵押拍卖；只因为在南部地中海之滨晒太阳，在西部临近英吉利海峡的多维尔小城的海滩上晒日光浴，那才是真正的阳光的享受。

只要一进入每年的八月，法国人便慷慨地把巴黎的太阳留给了扫垃圾的黑人，摆水果摊的阿拉伯人，以及在中国餐馆打工的中国人。

巴黎显得门庭冷落车马稀，法国人中的贫困者，流浪汉，阿拉伯人，黑人，中国人在这个季节会变得特别友好，互相拍拍肩膀，竖竖大拇指，“你好我好，出去度假的法国人是王八蛋。”

我寄居的那一条小街上一家兼卖六合彩、香烟的咖啡店，主人刚刚驱车去南部海滨，门上贴着手写的告示：休假一个月。当天晚上，三个黑人小学生便在玻璃窗上歪歪扭扭地写了几行油漆大字：黑心老板要在高速公路上翻车，或者被地中海的风暴卷走，你穿过阿尔卑斯山的时候，会从白峰掉下去，你的钱将找不到主人！

休假回来后，我看见这又高又胖鹰勾鼻蓝眼睛的法国佬，脸上阴沉了足足有一个礼拜，而擦去这几行大幅标语的，是他临时雇来的黑人。

几乎是每天，我出门去买中文报纸时，路过这家咖啡店总会进去坐一坐，喝一杯又香又浓的咖啡。

我刚坐下，以往傲慢得很的老板走了过来，说了一通，我只听懂一句：这条小街。

邻座是一个来巴黎15年的柬埔寨华侨，我们常在咖啡店里点个头，道一声“早上好”。他赶紧翻译给我听：“老板说，这条小街在从前是很平静的，都是法国人，有钱也有礼貌。”

“现在呢？”我问他。

“现在？阿拉伯人，黑人，还有你们中国人，这条小街不太平了！”

我指指窗外，“黑人在扫地，阿拉伯人在卖水果，中国人在打工，这并不妨碍你做老板，怎么样？”

“可是有人在我的店门上写咒骂我的标语，你知道法国人是不是会骂法国人的。”

我告诉这个鹰勾鼻老板，你应该去警察局报案，我没有兴趣和你谈这个问题。

“你对什么有兴趣呢？”

“历史。你应该知道一百多年前，中国是一个更平静的国家，离开巴黎很远，在东方。可是英法联军用洋枪洋炮打进了我们的国家，占领了北京，杀我们的妇女、孩子，一把火烧毁了圆明园。联军中就有你们的法国兵，你们的国家博物馆里现在还陈列着从中国从圆明园抢来的我们的国宝，你们的说明书上说这是法兰西历代国王收集到的文物，你有兴趣听这一些吗？”我点燃一支烟，等待着鹰勾鼻老板的回答。

他先是作了个无可奈何的手势，“如果你们打赢了呢？”他得意地一笑。

“我们被人侵略，打不过人家，输了，割地赔款，这是我们的耻辱，但老板先生，你觉得这是法兰西的光荣吗？顺便我正好告诉你一个法国人骂法国人的例子，那就是维克托·雨果，在那场野蛮侵略中，只有一个法国人就是作家雨果骂了你们的政府，骂了杀人放火的侵略者，并且说这是法兰西的耻辱。”

“他早已经死了。”

“历史还活着！”我站起来，留下一个法郎的小费，老板赶紧把一个法郎抓在手里。

三、被法国婊子告了一状

有一个自己有一辆好车的中国人告诉我，他好端端地在公路上行车时，经常会被那些开着烂车的法国人骂，或者故意撞他新车的后背箱。有一次，

在巴士底广场附近，他忍无可忍从车上跳下，手里握着一把修车兼防身用的大号扳手，拉开后边那辆车的前门大吼：“你下来，法国佬！”

那个法国人赶紧把车门拉上，脸色煞白。“NO！”他就是不下车。

后边长龙似的车队不断地鸣笛。

围观的人愈来愈多。

法国人、阿拉伯人、从英吉利海峡度海而来的英国游客，就连法国警察也清清楚楚地看见，这个中国人开的车被后面那辆烂车撞过的痕迹。

法国警察问我那位中国朋友：“你手里拿的是什么？”

“扳手。”

“干什么用的？”

“修车，也可以揍混蛋！”

“谁是混蛋？”

“从美丽城一路跟着我，撞了我三次后背箱而又不愿意下车讲理的那个人，你说是不是混蛋？”

“是混蛋！”围观者中的外国人几乎是齐声高呼。

法国警察挥了挥手：“走开！全给我走开！”

“你应该好好地教训一下你的同胞，否则他早晚得挨揍。”中国人总算出了口气，可是第二天巴黎税务局的人就找上门来了：买车的发票、报税单、银行存款记录，加上居留证、护照查个够。

谁都明白这是个信号：罚款的信号。

一点也不用夸张，法国社会是靠各种“纸张”维持的，我曾请教过不少在巴黎的华人，这“纸张”一词，是不是中国人的发明？

纸张沉重得像石头。

居留法国的缺一不可的纸张有几种：入境签证、签证类别、临时居留证、银行帐号、担保人的各种文件、住房证明。住下以后，则是每个月的房租单据、水电费收据、电话费收据、月工资清单、报税单。为了奔一个国籍，除了必须学好法语外，小心翼翼地把各种单据逐月逐类地分别保存，五年下来已经是厚厚的几大本了。

地铁站里，警察不时地会查你的纸张。

税务局、警察局随时可以敲门而入。

更要命的是，为了应付别人的诬告，或别的无妄之灾，你必须要把你所购买的大件、贵重物品的收据发票保存妥贴，以备查究。

一位开外卖店的中国朋友告诉我，法国人的

喜欢打小报告、操起电话往警察局告恶状，是世界一流的。他的外卖店开在一个住宅楼群里，炒菜的过道紧邻着楼群的天井。中国人开的外卖店自然要有中国菜，那就得开油锅，炸、炒、抽油烟机把油烟抽到天井里，油烟味四散开去。楼里有两个从不上班白天黑夜在床上狂呼乱叫的法国女人，便轮流给警察打电话：“一个中国人，不知道在锅里用滚烫的油炸什么东西，味儿要把人呛死，你们快来！”

警车呼啸而至。

一个小外卖店，整洁、干净。

一对中国夫妇彬彬有礼地请警察喝咖啡。

这是一位态度随和的年轻警察。

“有人控告你们在锅里炸什么东西。”

“我在炒菜。”男主人领着警察，走到过道的炒菜锅旁。

过道里堆放着一些洋葱、土豆、胡萝卜。

男主人寻思一番后说：“我做给你看看。”

开煤气灶，锅里倒了二两油，然后是倒进去一碗青豆。

警察点点头，说：“油烟味是有。”

我的那位朋友问：“那么我的法国邻居炸牛排呢？”还有，他拉住警察，“你听听，这是什么声音？”楼上传来的一个女人的嗷嗷乱叫声，那是不加任何控制的渲泄，还有床板震动欲裂的声音。

“他妈的，婊子！”那位警察骂了一句。

警察看着过道另一侧的几排书架，一律的中文书，有些不解。女主人微笑着介绍自己的丈夫——他是为了谋生而开的外卖店，其实他唯一的爱好就是买书读书，他一天也离不开中国的书。

警察笑着问男主人：法国文化和中国文化，你作过比较没有？更喜欢哪一种？

“很难说得清楚，这是一个太广泛太复杂的问题。总的来说，这两个国家都是文化的大国，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法国文化象天上的彩云，而中国文化则是原野上的黑土。我当然更习惯于吸收中国文化，因为我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

也许是这一番不卑不亢还算有见地的话感动了这位年轻的法国警察，从此以后他常常到店里坐一坐，喝一杯中国茶，那个疯狂的法国女人再也不去告状了。

交往中一个不可避免的话题是：“你那么喜欢中国，可是你为什么到法国而且希望长期居留下去呢？”因为已经是朋友了，说话也比较随便，警察还会认真地劝告我的朋友，“在法国尤其在巴黎生活，

太难了。我们法国人都这样觉得，口袋里老是没有钱，长此下去你们怎么办呢？”

我的那位朋友没有认真回答他的问题，而是注意到了那一句“口袋里老是没有钱”，用中国话让太太包了3000法郎一个红包，“小意思，喝一杯咖啡。”

法国人喜欢女人喜欢钱，这是闻名世界的。官场上金钱与权力交织的丑闻也时有发生，但这位警察认真地拒绝了：“我不能花你的钱，你们挣得太苦，法兰西的道德正在沦丧，我想也许我们有一天都会随着一艘沉船沉没，我信上帝，我只是希望上帝在我不得不跟着这艘船一起沉没的时候，能看见我的良知还算是清白的。”

我的朋友大为感动：“法国人当中少有的！”

外卖店、杂货店、水果摊，这些小老板们在五彩缤纷的巴黎挣扎得太辛苦了！他们从没有自己的假期，他们没有一点时间安排自己的生活，巴黎很美，有塞纳河有草坪有狗有鸽子有皇宫有广场有喷泉还有海峡城堡阿尔卑斯山的雪樱桃葡萄酒香槟白兰地，与他们有什么关系？他们没有时间享受，他们早起晚睡夫妻两个人一个采购一个烹调，一个端菜一个收银，夜十时十一时，总是希望等到最后一个顾客，深夜关门后又是擦洗扫地，一倒下就着，夫妻之间两三个月谁也不碰谁，那是太正常了，为了赚一点钱，太累！

还是几年前男的追女的那阵子，吃过海鲜盘上过馆子看过一次城堡，自从搬到一起住合伙开店后就是炒鸡蛋、烙饼！

辛辛苦苦赚几个钱，然后是交税！税务局的人一个个都象孙悟空突然出现在你的店门口。查帐，新帐老帐，收银机里当天的营业额，店主申报的营业额，一起查。十查九罚，开支票交钱，出门的时候笑嘻嘻地“再见！祝你好运！”

随之产生的是一种报复心理，其实质是无可奈何。经过路边花坛的时候，把鲜嫩的刚刚开放的玫瑰掐断，踩在脚下；走进超级市场操起两个苹果装在裤兜里；夜深人静的时候往大街上撒一泡尿……

“我是纳税人，我交的税太多了！吃一个苹果算什么？”

往大街上尿尿又是为了什么呢？

好像随时都会掉进一个深渊。

巴黎是一个布满深渊的城市，连接这深渊的是精神的独木桥，心灵的空洞里一片墨一样的黑色。

那些浪迹异乡的中国人，几乎人人都是孤独的，不同的是或者在孤独中挣扎或者在孤独中沉

沦。

四、一个老红卫兵在法国

他的身边是一个简单的显然是他自己手工制作的画架，画架上的一本翻开的剪贴簿贴着他的黑白、彩色剪影作品，毛泽东、列宁、戴高乐、里根、布什、密特朗给挤到了边上。

他瘦瘦的，一米七的个儿，草绿色的军装军帽，洗得发白了，四十来岁。偶尔有游人经过，他点头一笑不主动招揽客人，一副愿者上钩的样子。

我站在他的面前，递过去一支烟。

“中华烟”，朋友刚从国内带来的。

我们都默默地抽烟，我陪着他，谁也没有多说话。一个多小时后，我提议：“去喝一杯咖啡，怎么样？”他收起画架。

我们坐在巴黎市政府对面的咖啡巴里。

“来巴黎几年了？”我问。

“1971年到的，你呢？”

“我是1989年下半年来的，”我想我应该多说几句，“我是个文人，关门写作，累了便出来逛逛，不认得路，也就是圣母院、蒙马特高地几个地方可以走走。”

他笑笑，表示可以理解。我便单刀直入了：“你是穿着这身衣服到巴黎的吗？”

他点点头：“我是北京的一个小红卫兵，十一个同学串连到了云南橄榄坝，那里的老百姓真好，给我们吃的留我们住，那么多的青山绿水走到哪儿都能听见鸟叫看见树木，可惜那时候我们是要去参加世界革命的，那么多的人民在水深火热之中，橄榄坝的怀抱终于留不住我们，姑娘们的眼泪也留不住我们。我们十一个男子汉到了缅甸，找到了缅共游击队。”

曾经听说过，一批南下的红卫兵在缅甸打仗，这件事还惊动了周恩来总理。

“打仗？你会打吗？”我很惊讶。

他淡然地笑笑：“很多事情是凭着一腔热血，血是热的就行。有了热血燃烧的精神，有枪有子弹，不怕死，在深山老林里转了三年打了三年，凭着我们的勇敢和机灵，十一个弟兄三个挂过花，没有死一个，每人都立了功。三年后我是团长，别人也都是营长、副团长，带兵，靠的就是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退我进，敌疲我打，敌驻我扰。”

“国内呢？比如父母、同学，有联系吗？”

“也许是疯了，几乎没有想过家，也没有时间想，比打仗更苦的是转移、突围、走路，从这个林子走到另一个林子，永远是沼泽、藤蔓，我们就在这天罗地网里转悠，有几次打到了仰光郊区，埋伏的时候碰到几个早起化缘的和尚，能说中国话，我和他们聊天，和尚说这里的百姓‘还算安居乐业，也有清贫度日的，但都希望世道太平。倘若战端一开烽烟四起，老百姓真是苦海无边了！’这些话我听得陌生也新鲜，用望远镜四下里仔细观察了一番，只见一家家农人小舍屋顶上炊烟缕缕，小路上赶车的挑担的都往城里去，槟榔、木瓜、菠萝络绎不绝……我一下子呆了，不知道该去打谁？跟谁打？部队没有粮食了，抢老百姓的吗？三年来，基地司令第一次派我出来单独执行任务，怎么交差？”

“老和尚看出了我的困惑，便说‘司令如果同意不开枪伤及无辜，敝寺愿献出一点点香众施舍的积蓄’。我摇摇头，当着和尚的面下了撤退的命令。”

“回到林地之后是一场火拼，司令把我五花大绑要枪决我，我的红卫兵兄弟带着一百多个弟兄迅雷不及掩耳包围了司令部，执行枪决命令的行刑队员手抖了，第一枪只打穿了我的肩胛骨，他再没有能发出第二枪，我的参谋长把他给解决了，混战中我的部下伤亡惨重，一同南下闯天下的十个兄弟全部牺牲，我带了三个警卫员逃出丛林。还是那位老和尚救了我，养好伤，我把仅剩的一点钱给了警卫员，他们都是缅甸人，让他们回乡，老和尚也凑了点钱物。我告诉他们‘回家，当农民做生意干什么都行，不要再回到丛林中去。’”

他长长地吐了口气，把一杯浓浓的意大利咖啡一饮而尽，“我永远不会忘记离开缅甸前我和老和尚的那几句对话。”

“家山相望，父母在堂，施主该回中国去吧？”

“我真的想家想北京了。北京的胡同，冰糖葫芦羊肉串，一别五年父母大概以为我死了。”

“那就赶快走，我可以为你安排一切。”

“不，我不能回去。我带出来十个人全死了，为我死了，我怎么回去？但又不知道哪儿该是我去的地方！”

“千山万水一念之间。施主执意不回中国，蝼蚁尚且可以生存，更何况你一个七尺男儿？但，贫僧却要敬告一句：无量功德只缘一个善字，不可再开杀戒了！”

“我坐一只小船走了七天七夜，到了泰国，码头上和尚的师兄给了我一本护照，又替我买了飞机票，我到了巴黎。那时候巴黎的外国人尤其是中国

人极少，我用最后的二百法郎买了剪刀、纸张，在街头剪影，总比伸手讨钱好一些，不少好心人帮我的忙，一个法国老太太把我接到家里帮她看楼剪草坪把园子里几棵栗子树上的栗子摘下，分送给邻里，她给我提供免费的住宿，五年前老太太死了，老太太小女儿一家搬了进来，我还是干一点杂活直到今天。”

“你怎么会想到干剪影这一行呢！”

“我在巴黎圣母院前面的广场上，最早见到为游人画像的是三个波兰人，中学时我也喜欢画几笔，学过剪纸，第一幅剪影是在美术课上把美术老师给‘剪’了一通，老师很年轻刚从美院毕业，她看了我的作品说：‘送给我，可以吗？’”

稍顿，他告诉我：“都是逼出来的，只要生活无情地逼着你，在你成为疯子之前就可以创造不少奇迹。”

岁月流逝着，但，死去的十个战友的一幕却永远无法从他的记忆中淡薄。他在欧洲流浪，他在一切陌生的地方——海滨、城市或阿尔卑斯山——寻找心灵上的安全感。

“其实，别人并不知道你的过去，你所拥有的也不过是属于自己的经历，你没有犯罪，何必这样在自责中沉重地活着呢？”我想开导开导他，“况且，你的父母的日子更难过。”

他的眼神里是忧郁和深深的惘然。

他长叹一声道：“我父母生出的儿子已经死了，我父母创造的人还活着。”

我惊讶不已。

但，这是一个真实的人，我们曾经有过类似的一段经历，在人生的岔路口，他勇敢地走向的是真正的非凡和卓越，他认真地选择了孤独。

他说他来法国后每天买中文报纸，大体知道国内的情况，他说今天的中国他已觉得陌生，然而那是故土故国，他在海外呆一天他便是流浪汉，“什么‘美籍’、‘法籍’，生生死死我是中国人，我为中国自豪！”他恢复了自信，支撑着他心灵和骨架的是那一块遥远的文明深重苦难深重的黄土地，以及黄土地上的春草秋水。

他忽然问了一句：“这些年北京冬天的雪大不大？”

“总有那么几场大雪。”我说。

他吟哦着：“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他说为了看一眼雪看一眼大雪在空中纷飞天地为之失色的景观，他每年冬天都要去一次德国北部，在雪地上走任雪花在脖子里变成水滴，眉毛胡

子都是白的。“有时候我想倘若真有圣诞老人在雪地上踽踽独行，我就是他的伴侣，我会抓一个把他送到中国，给中国的孩子们。”

就这样他出来了。

就这样他不再回去。

就这样他的心里只有中国。

五、蒲先生巴黎发迹记

卢浮宫一侧，从世界艺术宝库中浏览一番的人们出来后必到的一条购物街，各种纪念品、T恤衫、人造宝石闪闪发光，“蒙娜丽莎”谜一样的微笑你走到哪一个角落她都会对着你笑……这些林林总总的店铺的东主，一般都是赚钱有术的犹太人，小有遗产的法国人或者是前几年暴富的台湾人，有一个却是三十年前离开大陆的中国人。

他的老家在青岛崂山海滨。

人生真的像梦一样，尤其是回首往事的时候，尤其是那些生活中历尽艰难却又不幸还没有被上帝召唤回去的人。

我称他蒲先生。

很多人以为他是蒲松龄的后人，他说不是，查过家谱不是就不是，不能丢掉自己的祖宗认别人的祖宗。很多人给他出主意，法国人就喜欢吹牛皮，你的牛皮比他吹得大他更喜欢，你就说你是蒲松龄的七代六代要不九代十代后人又怎么样？蒲松龄反正也是中国人，怎么着也是光宗耀祖。你再把《聊斋》里的几篇背得滚瓜烂熟你就说这是祖上传下的家训，必须倒背如流，除了蒲松龄的玄孙子玄孙子谁做不到？

他终于没有去认蒲松龄做老祖宗，然后靠他出名，出名了之后又说蒲松龄算什么？不是他给我增光是我给他添彩。

他是学唱歌的。1957年，蒲先生跨进中央音乐学院的第二年。他的父亲——一个多年从事地方志整理研究的学者，突然被批斗，随后又被定为右派。母亲带着三个弟弟一个妹妹，不知何以为生，蒲先生退学回家，挑起了维持这个家庭的担子，远在青海劳动改造的父亲写信给他：“三弟一妹，惟你是托了。昭昭天日，父亲在地底下念你谢你！”这是一封绝笔信，一年后母亲又辞世。

不知道那时候人会有这么大的承受力，居然活过来了。每天俟最小的弟妹睡下后，蒲先生便带着两个大弟弟，去崂山上捡石块、挖树根、采各种野

花的种籽，然后做成各种小盆景在路边上摆摊。第二天天不亮便下地干活挣工分，人的欲念到了最少的时候也便是最坚实了：不能让弟弟妹妹饿着！

都长大了，一个挨一个都成人了，三年自然灾害开始，阶级斗争要天天讲，“一讲阶级斗争，我知道又要斗到我们家头上了，父母亲都斗死了，还斗不完！”一个偶然的的机会，从南方来的一位蒲先生父亲的旧友对他说：“走吧，到香港闯闯世界去，打工过日子，至少没有人斗你。”

“我一听那边不讲阶级斗争，二话不说带着弟妹就走了！”

走了，一走三十年！坐小船偷渡出境的。

弟妹们各奔前程，蒲先生自己，则从香港又到了加拿大。在加拿大挣了一点钱再到巴黎报考音乐学院，一边打工一边读书，先是唱美声、意大利歌剧，上过奥培哈歌剧院的舞台，那年月就他一个中国人。

毕业了，一张文凭到手，靠唱歌却活不下去，那么多高鼻子蓝眼睛都找不到剧院，何况一个中国的歌唱家？

他在卢浮宫周围转悠了不知多少次，他不是欣赏伦勃朗的画、罗丹的雕塑，他浑身都是艺术细胞，可是他要吃饭。那年头两个法郎就能买到一根棍子面包，如果不吃饭，那些艺术细胞就会萎缩、枯死，什么样的细胞都是附属乎生命而存在的。

在无数次的求职申请、约见、填表的徒然往返之后，他已经身无分文。蒲先生靠在巴黎十九区的一根电线杆上，对面就是咖啡巴，六个法郎一杯浓浓的香香的意大利咖啡……

那是游人众多的季节，天热了，他已被房东逐出家门了，便睡在露天，那么多人无家可归，打个招呼相安无事，在蒙马特高地、巴黎圣母院、共和国广场都能找到一席之地。那些醉鬼、吸毒者、在逃的罪犯们，对蒲先生却极为友好，他们又多了一个街头露宿的朋友，在这些一文不名的人中间，种族是平等的，谁也不比谁高贵。

一个阿拉伯少年在兜售T恤，印着巴黎铁塔的T恤，买T恤的人还不少，蒲先生眼睛一亮，想起在一次音乐会上，他唱完“卡门”的选段，一个华人紧握着他的手说：“你要是唱中国歌多好！”他又引吭一曲《在东北松花江上》——老华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强征到欧洲作劳工的，现在罗森堡公园右侧开一家T恤店。

蒲先生当时实在没有想到，他的这个念头使他走上了一条不归路——卖T恤，以后的几十年他

便和每年都是不同款式的T恤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成了颇具规模的一家T恤店一家礼品店的老板。

他找到那位老华人，借了十件T恤每件以二十法郎计价。

老华人说，你去读书、唱歌、我卖T恤支持你。蒲先生摇摇头，他知道在这金钱第一的世界里，他必须要有自己的钱。

他坐地铁到了凯旋门，在游客中兜售，十件T恤不到一天便以四十法郎一件卖光了。然后把二百法郎还给老华人，另外的二百法郎又买了十件再去卖。蒲先生说到这里格外提醒我，“这是我做T恤生意最早的本钱、是我自己的二百个法郎，从此以后赚的钱便都是我自己的了！”

他走遍了法国南部，他是爬着上阿尔卑斯山的，他背着两个大旅行袋的T恤，在尼斯海岸在阿尔卑斯山度假地卖T恤。他的货源就是城镇的T恤店，然后背到山上背到海边，走别人不愿意走的路，赚别人赚不到的钱。

他去爬阿尔卑斯山的时候，根本不知道阿尔卑斯山有多高，即便是盛夏巴黎人光着膀子的时候，山上还有积雪凉风阵阵。他不得不一路兜售，否则他实在背不动了，上山也背不动下山也背不动。他告诉游客，“我给你们准备了下山的服装，这是巴黎今年最时髦最流行的T恤，蒙娜丽莎的微笑陪伴着你，你会好运！”

他的窍门是总比别的摊贩便宜一点，一个郎到三个郎之间，他根据顾客性别年龄大小，从各个T恤店买来了各种款式的T恤，人们都爱挑挑拣拣，人们都喜欢价廉物美的便宜货。他还有一付好嗓子，时不时的唱一段，吸引了很多游客，他的英语、法语都说得不错，有人问他“你为什么不唱歌，而要卖T恤？”他说“我为了唱歌，不得不卖T恤。”

蒲先生告诉我，挣扎的时候奋斗的时候，感到累不觉得痛苦。一个被贫困折磨的人，他的人格只能渐渐地萎缩，然而痛苦和负担却也会随着金钱接踵而至。他被一群阿拉伯人抢过三百件T恤，一抢而空，他不得不雇了三个黑人，一个望风盯住警察，一个守摊，一个做他的贴身警卫。那一天是戛纳电影节开幕，五百件T恤一抢而空，他高兴了，请这三个黑人兄弟去喝啤酒，被三个黑人灌得烂醉如泥，轻松愉快地把他身上的钱掏个精光，溜了。过去每天他都把钱存入银行，就马虎了这一天，他醒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他在沙滩上睡了一

夜，一睁眼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摸钱包，空的。他找那三个黑人，找了两天，小城的大街小巷都转遍了，终于在一个名叫露易丝的酒巴里碰着了。黑人拔脚就跑，他抓住一个使劲地揍，法国人喜欢看热闹，中国人和黑人打架他们很高兴，不偏不倚地为双方加油，那个黑人小伙子很聪明，不失时机地对蒲先生说：

“老板，我还你钱，我们不能再打了。我们同属第三世界，干吗让法国佬高兴？”

蒲先生稍一犹豫，法国人便大声地喊：“撕烂他！撕烂那个黑鬼！”

他把举起的拳头收了回来。

他走了。

蒲先生再回巴黎的时候，买下了一家T恤店，从此游人走向卢浮宫的路上，会看见唯一的一个中国老板，“T恤！T恤！一件一百两件一百九十法郎！”法国也是物价飞涨的地方，法国人也说“什么都涨价，就人不涨价。”

他有了钱便自己灌唱片、录盒带，做广告。他唱中国民歌，从青海的花儿到湖南的浏阳花鼓，从抗战歌曲到近几年中国大陆的流行歌曲，他唱《在东北松花江上》、《血染的风采》时总是热泪盈眶……

他去了台湾、新加坡、马来西亚、香港、北美、澳大利亚，走到哪里唱到哪里。他为自己刊登的广告上写着：“把中华民族的歌声唱遍全世界！”他的音乐会名为“大汉风”。

蒲先生一直想回大陆看看。“那是一块过去我只记得恶梦、后来才又渐渐地发现也是千丝万缕地吸引着我的土地，那是我根之所在叶之所归魂之生养的地方，原来我卖T恤我唱歌我奔走在海外天涯，至少其中的一部分是为了我心中抹不去的思念！”

1991年夏日的清晨，他步出北京机场，大口地呼吸着空气，他哭了！

“没有错，那是我的祖国！”

青岛崂山，他已经找不到自己的老家，母亲的坟还在，烧一炷香叩三个头，用手帕包好一抔家乡的泥土，稍事游览，接着便是听音乐会，学新歌，灌唱片，行色匆匆地回到了巴黎。他请我听他刚谱写的一支独唱歌曲：

我走在香雪里榭大街上
明月秋风华灯初上
一个忧郁的少女

向着小巷走去
我的同胞骨肉我的中国姑娘
夜已深风正凉
姑娘你寻找什么你走向何方……
我走在香雪里榭大街上
满目皆是文明的辉煌
又何必去问他人
脚踩漂流的寒霜
我的同胞骨肉我的中国姑娘
人世间还有梦
在遥远的东方在你我的故乡

六、中国人到法国来找孤独

人们正在谈论都市的罪恶。

政客云集垃圾堆砌吸毒行凶明枪暗箭物质流把人类的欲望推向一个又一个高峰，上帝您看见了吗？

即便是巴黎郊区，只要人口的密度稍稍减低，古堡和教堂野生的丛林杂草还多少保留着一点历史的真实，塞纳河的流动便会疾速许多，有滑板有小船有水草的气息飘来，河边的林间小道上落叶积聚着，松鼠在树杈上闪动着小眼睛，鸟儿从耳朵旁飞过，河畔咖啡店的老板娘对于光顾咖啡店的任何一个人都报以微笑，她会向你介绍：“我这里太美了，有真的塞纳河，有森林，那些瞧不起外省人的巴黎人，挤在一个个小咖啡店里，不像沙丁鱼罐头像什么？你尝尝我的咖啡，不香不浓不是纯正的意大利味道，你别付钱。”

她的咖啡，味道好极了！

有一对来自中国的青年男女，就住在这咖啡店后面一座年久失修的小楼的顶层。他们在巴黎市内读书、打工，然后坐地铁、换快线、再转郊区火车住这儿，也许是在逃避热闹？

“不！我们逃避来逃避去，最终是在逃避自己。”

娴静的湖南姑娘小李这样说，她的同居男友——一个东北大汉点点头。

他们刚相识不久也是刚搬来不久。这个名为落叶山庄的小地方，真如世外桃源一般，白天和夜晚都那么安静，安静得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们两个人一样，那时候要的就是这安静。

周末的一个下午，他们携手去林间散步。

那是夏之初，草已绿，树木散发出湿润，几朵早开的野花星星点点地晃动着。

迎面走来一个法国老太太，臃肿的身体吃力地借着拐棍挪动着，红毛衣黑裙子外套米色的风衣，法国人穿衣服真是绝了，男女老少都会穿。法国老太太主动和他们打招呼。

“下午好，太太！”年轻人很有礼貌。

他们擦肩而过。人生不知有多少次偶然地相遇便擦肩而过，连回首都不必的。

可是他们回头了，老太太在呼唤并且问：“我能跟你们聊几句吗？如果你们这一对可爱的年轻人不拒绝的话，我会感到荣幸。”

“当然可以！”大凡人心情好的时候，话也多。

他们——老二少重新碰头了，坐在林子里的一堆干木材上。

法国老太太真能说：“我一看你们就是中国人，东方是日出之地，基督降生的时候，最早传递这信息的便是东方来的三个博士。你们中国人讲夫妻恩爱，法国人尤其是法国的男人讲性释放。和女人睡觉就像吃蛋筒冰激凌一样，吃完一个薄荷味的丢掉再换一个柠檬味的。你们来法国，我可是欢迎的，让法国人看看中国的夫妻是什么样的，一起打工一起挣钱一起散步。你们得赶紧有个孩子，从小学法语就省力多了，现在的法国年轻人就知道疯狂，喝酒喝得疯狂，吸毒吸得疯狂，开车开得疯狂，作爱作得疯狂。他们不要孩子，我怎么也想不通为什么不要孩子？你瞧这山庄几乎看不见孩子，一个没有孩子的世界没有孩子的笑声哭声的世界，是可怕的世界。法国的年轻人已不再听老人的话了，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也一样，大了，走了，男朋友女朋友不知道换了几个，就是不生小孩。”

两位中国的年轻人好不容易插上嘴：“太太，那么您的先生呢？”

法国老太太顿时怒目，“我年轻的时候长得很漂亮，会拉小提琴会弹钢琴会做苹果酱，我的祖父有一个很大的葡萄园自己酿葡萄酒，我的祖父和梵高住一个村子，你们知道梵高吧？我的父亲从小喝他爸爸酿的葡萄酒喝成了一个酒鬼，说来你们不信，他一辈子没有喝过一滴矿泉水或者是茶水什么的，就喝酒，吃烤肉喝红葡萄酒，吃海鲜喝白葡萄酒，临睡前喝柯尼雅克，早晨起来喝香槟。你说他一辈子喝了多少酒？他活了84岁，他死的时候，我祖父留给他的那个葡萄园里的最后一株葡萄也让他喝光了，全卖了，一把一把的法郎变成了一瓶一瓶的酒，可是我父亲死后他的酒窖里却是空的。他问我

妈妈，他已经不行了，说话也口齿不清了，‘还有酒吗？’我妈妈告诉他‘没有了，’他叹了口气说，‘我可以走了。’我父亲自己是酒鬼专门交喝酒的朋友，我18岁那年他摇摇晃晃地领回来一个一样摇摇晃晃的年轻人，对我说‘玛丽莎，嫁给他，听见没有？记住不喝酒不抽烟的男人是小男人！’”

“您就嫁给他了？”

“那可不行，我们那时候法国不是现在这样的，再说保罗长得可真棒，他跟我爸爸不一样的是先拼命干活，他是有名的酿酒师，干完活再喝，喝得眉开眼笑。等我生下第一个儿子，保罗时来运转，他被巴黎市政府的品酒协会聘请为高级品酒员，成天穿燕尾服出入大酒店，月薪二万法郎。唉！你可不知道男人就像风筝，一飞出去就轻飘飘，再说巴黎那个地方骚娘们也多，腿长长的腰细细的胸脯高高的嘴唇红红的，把他的魂给勾走了，一出门就说忙，一回家就说累，儿女长大了，他也干脆不回家了，我女儿就抱怨过，还不如让他烂醉在家里的好。”

法国老太太太孤独了。她的这些故事除了三个已经听得不耐烦的儿女外，只跟她现在的唯一伴侣——那一只名为“皇后”的西班牙狗诉说无数遍。

老太太临走的时候还留下了电话，祝他们俩口子好运，“生一个东方小美人！”

老太太走了。

小李哭了。

小李和那位东北大汉不是夫妻，俩人各有家室，小李有一个6岁的女儿，他的儿子刚满9岁。他们也不是那种开放得怎么着都可以过的人，自费出国真是为了有所深造，回国图个发展。留守的丈夫和妻子省吃俭用，不仅要独自挑起抚养孩子的责任，还在盘算着怎么还债。

一般来说，没有离开国门的时候，都把国外的生活想象得太简单了。

置身异国，新鲜感像一阵风吹过后，便是一片落叶在沧海中翻腾的感觉，或者是在沙漠中迷了路，别人以为是清泉和草地的一切，在自己眼中全是无边无际的大漠，挪动每一步都需要勇气。

孤独，每一个人都觉得很孤独。

而且，没有地方很少有人可以诉说孤独。

法国朋友说：“你太幸运了！”

国内的朋友在电话里直说：“哥儿们，你回来，咱俩换个地儿怎样？”

同在海外的国人都在忙，忙着找工作，忙着搬家，忙着去警察局办纸张，忙着背单词，忙着找便

宜商店采购……

因为环境的彻底改变，人们的心态也在痛苦地调整或者说是扭曲，最热门的话题永远是钱，怎么挣钱怎么省钱，吃方便面省还是吃棍子面包省，怎么省怎么吃。也有既不愿意挣钱也无所谓省钱的，就骗，开公司做生意，除了中国的长征火箭、原子弹，都能弄到手；都能开出批条来。

在这种时候，倘若碰上一个真正可以说几句心里话的人，便如饮甘露，当然谬托知己也时有发生。

孤独者碰上孤独者，故事便发生了。

小李和她现在的男友是在一次留学生的聚会中相识的，不过是相互留了个电话而已。

有一天半夜，电话铃响了，是小李的声音。

“对不起，打扰你了吧？”

“没有，我很高兴接到你的电话。”东北大汉在家里待了一天，一天就没有响过电话铃，他正冲着墙壁发愣。“你是不是不舒服？这么晚了还不休息？”

“你说我们来法国干吗？像这样活着受洋罪有什么意思？”

“小李，别忘记这是你自己选择的，还有，我们随时可以回国，后悔药的唯一服用者是那些意志薄弱的人。我在想至少得把语言学好，回去找个合资企业混碗饭吃，要不然怎么办呢？”

“那还不是混？还不是为了一口饭，人活着怎么那么没劲？”

“平心一点，小李，《圣经》说人从生到死，中间的一片开阔地长满了迷惘的荆棘，也许人生就是这样的。”

“在中国就觉得活得累，到了巴黎更累，原以为自己很坚强一个人闯荡个三、两年，哪怕给女儿挣一笔钱，这倒好，挣的钱全交了房租电话费了！”

“说实话，小李，我也烦着呐。不过我总是设法换个角度去想，总算可以近距离观察一番西方吧？另外尽量多看书跟中国作比较，一百年来法国社会和中国社会的变迁，这里会引出很多可以深思的问题。”

小李的情绪稳定一些了，“你平时怎么吃？”

“怎么简单怎么来，特别想吃粉条炖肉、饺子。”

“星期六下午我给你包饺子，好吗？”

“太好了！咱们到时再好好聊。”

三天后，吃完饺子这一聊，便再也没有分开，很自然，只是因为欲望，因为太孤独。

陶醉总是暂时的，总有清醒的时候。性爱不能

替代男人想儿子女人想女儿，注定的同床异梦。

半夜里电话铃响吓得谁也不敢接，谁知是他老婆打的还是她丈夫打的？

他们努力地去调整，去抚慰对方，各自记住了对方孩子的生日，买东西、寄包裹，催促对方寄钱、打电话。尤其是小李的男朋友，一天打三份工，上午去一个超级市场扛水果，下午在一家外卖店当大厨，晚上去中国餐馆做跑堂，确确实实，他心里不仅有自己的儿子，还有小李的女儿，他总觉得亏心欠了别人很多。有一个晚上他梦见小李的丈夫端着枪找到巴黎“轰”然一响，他从床上坐起来，一脸的冷汗……

他们幸福，他们痛苦，他们疯狂，他们冷静，他们忘乎所以，他们胆颤心惊。他们后来告诉我，这是一个有病的年代，我们都吃错药了……

人为什么要有欲望？

人为什么害怕孤独？

人为什么有血有肉？

在中国，扼杀欲望、制造孤独、无视血肉的历史可以说和封建社会一样漫长；而另外一片异国陌地充满着对欲望的挑逗乃至引导，谈性感说作爱如同吃色拉一般，及时行乐却并没有使这个社会显得生机勃勃，有愈来愈多的“失去”儿女的老人以及单亲孩子，对于这些行将走完生命之旅和即将开始人生之路者而言，孤独的阴影实在是太巨大了！

“法国人在法国就很孤独。”

“中国人到法国来找孤独。”

“巴黎是专门治狂人的地方，没有人理你。”

“巴黎先把你变成懒汉再让你成为酒鬼，醒来以后下定决心排除万难去做强盗或者骗子。”

据说，法国女人是这样评价法国男人的：“除了舌头，全是软巴巴的！”

巴黎有很多怪论。巴黎无所谓，巴黎还是老样子，葡萄酒那么醇，咖啡那么香，红磨房里的性表演天天爆棚，白教堂圣洁得雪白……

或许，这也是文化和传统的顽强使然？

同样的根源，来到巴黎闯世界、洋插队的中国人，尽管偶尔也会吃西餐、开“洋荤”，但一般来说要不了多久就会认定“我是中国人”，而且是“地道的中国人！”在中国牢骚满腹也罢，历经患难也罢，不知道为什么想起那片土地，心里就发颤！黄土地、黑土地、盐碱地、沙渍地，一条大河波浪宽，谁不说俺家乡好，当三年游子，到头来比谁都爱国——这打开国门把人放出去留洋的政策真棒——有的青年朋友这样对我说。

小李生日的那一天，我送去一束鲜花。

小李的男朋友会唱歌，他先唱：“妹妹你大胆地往前走，往前走哟”……之后他又唱岳飞的《满江红》“八千里路云和月”……

他唱得泪流满面。

他说：“高兴，那是因为高兴，来，喝酒！”

小李茫然而又眷恋地看着他。

酒过三巡，这才知道，小李就要回国了。“她先走，我把她先送走，心里好过一些，等她安顿下来，我也要回去了，我们结束了，但都在中国打个电话问个冷暖要方便得多。”

“我去机场接你。”小李说。

“带着你的女儿。”

我想我应该早些告辞，但他俩却一定要我留下再喝一杯，小李的男友并且说：“徐老师，有个不情之请，几次一直没有开口，想请你朗诵一首你的诗。”

我为他们朗诵了我在巴黎唯一朗诵过的一首诗。1986年深秋之夜，我在参加了一个讨论会后匆匆坐江轮赶去汉口看望我的母亲，在船上偶得九行：

你是走向遥远的风帆

我是走向遥远的思念

风浪隔断了我们又连接起我们

有没有阻挡的幸福

有没有边缘的苦楚

盼望着另一个秋天

红叶和黄叶都在秋风里盘旋

我是走向你的风帆

你是走向我的思念……

那一夜，天上有浮云有月亮，巴黎郊外安静得像一张白色的信笺。

紫藤萝悄悄地爬上了小楼的窗口……

七、她说：我不是中国人

也是中国人，她说“我恨透了中国人！”

她说：“我是日本人，不过我会说中国话。”

要不，就把中国话说得软绵绵地，“好高兴啊！好感动啊！好好吃啊！好美丽啊！”——从台湾来的中国人，有钱的中国人。

我去巴黎十九区的一个报摊买中文报纸，一个



显然来自中国的女人手里抱着五六岁的混血小孩，气喘嘘嘘地拉住我，说了几句法语，我告诉她：“你会说中国话吗？”

她说，她一张口便是满嘴的上海口音：“我是日本人，我有中国朋友我也能说中国话，是这样的，我的先生是法国人，开一家好大好大的服装公司的法国人，我们从里昂来，我们在巴黎有很多朋友，不过我们总是住酒店，至少是三星，我们来玩玩顺便谈一笔生意，我们要和中国人，不，对不起，要和日本人做生意……”

这是一个神经绝对有问题的女人。我不得不打断她的话，我实在没有兴趣听一个不敢承认自己是中国人的人唠叨：“对不起，你说的这些跟我没有关系，我要去喝咖啡了。”

“是这样的，我是日本人。”

她还不放过我，她以为她说自己是日本人，便可以得到所有路人的敬重。确实，日本人在法国已经很牛皮了，何只是汽车的涌入？一个又一个的葡萄园让日本人买下来了，他们已经昂首进入巴黎的房地产市场，法国的旅游景点上堂而皇之地写着三种语言：法语、英语、日文。一伙一伙的日本游客摇着小小的膏药旗，穿梭在香雪里榭和红磨房的红灯区。不仅是法国富商就连犹太阔佬也都惊呼：日本军团围攻巴黎，用我们的话说是“鬼子进村了！”

法国女总理克瑞松上任伊始，便发表了直率却违反外交礼仪的谈话：“我们要反击来自日本的黄种小矮人的经济侵略！”

我不得不对这位冒牌的“日本女人”正言厉色了：“你真的是日本人？”

“真的呀！”

“不对，你是上海人，很不幸我们还是同乡。”

“依也是上海人？我是开开玩笑的。”

“我告诉你，我最恨日本鬼子，我不相信今天的日元能改写昨天的历史，忘记日本鬼子刀下的中国民众的冤魂，好好的堂堂正正的中国人不做，你不觉得这是耻辱吗？”我不吐不快，说完了又自觉没趣，和这样的人叫什么真？

她无所谓，也许她从来没有读过历史，她继续她的唠叨：“我的先生出去了一天，现在还没有回来，他把所有的钱都带走了，我和我儿子一天没有吃饭，真不好意思，能不能借一百法郎给我，我留下电话我一定还你，明天就可以还你，我把我先生介绍给你，他真的很有钱，我们在里昂有别墅……”

我扭头就走。

她尖叫一声追上来，“先生你别走，你千万帮帮

我！”

路边站着中国杂货店的金边华人老板，他解了我的围：“小姐，我刚从我这里要走一百法郎，你怎么不去吃饭呢？”

她“呸！”的一声，把一口痰吐在脚下，走了。

八、中国姑娘缚不住法国浪漫

巴黎是令人眩目的，无论是号称世界第一豪华的丽都夜总会，或者是红磨房的那一架象征性地转动着的风车，都在产生着两极效应：使活得沉重的人更沉重，让活得虚假的人更虚假。

沉重是生命的质感。

虚伪是不可救药的。

打工很累很沉重，那是靠自己活着；文化的包袱更沉重，但血管里炎黄子孙的血不会凉。绝大部分在海外的中国人都这样活着。

也有个别的例外。

我是在一次吃火锅的聚会中见到她的，她说她姓冯，福州人。

巴黎阴冷的季节特别长，几个四川的小哥儿们便常常弄个麻辣火锅，从成都带来的正宗汤料，十几个人一围便吃开了，一片“吱溜吱溜”声。

她显得特别的与众不同：“哎哟，太辣！”

“格老子，我不是跟你说得明明白白是吃麻辣火锅吗？”主人快人快语。

“其实我也可以吃一点辣，明天我要去度假，坐一个朋友的小车去尼斯，我怕上火，嘴上起个泡什么的。”

满桌的人都沉默了。

就怕碰到这样的主，还偏偏撞上了，从头到脚，嘴里吐出来的气，屁眼里放出来的屁，全是酸溜溜的，一帮小哥儿们互相丢了个眼色，要治她。

小周好冲动，说话却很幽默：“可能会起个水泡之类，”他从口袋里摸出一盒万金油，“你常常抹点儿，哪儿痒痒哪儿起泡往那儿抹。”

“格老子，别！万金油还能治痼疾？”开玩笑儿也是泡泡。”

“什么痼疾呀？我可不明白。”

“比艾滋病好一点，不过艾滋病看不见，痼疾可是看得见的，那玩意儿也难说。”

“哎哟，难听死了！我的男朋友是法国人，特别爱干净。”

小冯的这句话可是犯了众怒了，“法国人就比

中国人干净？你瞧瞧哥儿们哪地儿不干净，你瞧你瞧你仔细瞧，你爱怎么瞧就怎么瞧！”

那几天法国刚爆出一个轰动全国的丑闻——巴黎输血中心把带有艾滋病毒的血浆输给了患者，已经被查证的十多名死者和未死者的病人家属正在上告，政府有关部门眼看就要搪塞不下去了！

“格老子，哥儿们要不是嫌法国女人脏，还可以在巴黎多争点国格！”

哄堂大笑。

小冯走了，很委屈的样子，“我先走一步，明儿个还得早起，坐飞机头晕，坐小车有一千多公里呐，拜拜！”

“系上保险带！”

“戴好保险套！”

也难怪朋友们拿她开心，小冯的度假是出了名的，一年四季不知道度多少次假，又有好多次让人在地铁里撞个正着，慌话说惯了张嘴就来，因为她知道度假在法国是一种时髦，是某种身分的标志，把皮肤晒得黑黑的亮油油的，新潮的美感。可是法国人度假也是有季节的，虚荣使小冯失去了常识，“我要去度假”，成了她逢人便说的口头禅。

这是一个单薄、秀气涉世不深而又有几分神思恍惚的中国南方姑娘。

同桌吃火锅的她的女友道出了一段隐情。

两年前刚来巴黎的那个夏天，她正在咖啡馆给父母亲写信时，一个法国男子彬彬有礼地问：“小姐，我能坐在你的对面吗？”

她只能用简单的几句法语和英语跟他交谈，他们认识了，三、五天必在这咖啡馆里碰一次头，喝一杯咖啡，他教她几句法语。

随后，法国男人便邀请她出去度假。

临近英吉利海峡的小城多维尔市，别具一格的山城，木头房子，脚下的沙滩，对岸的英伦三岛，大洋的涛声如在枕头边缓缓地舒展，那一位法国男子诗意地对小冯说：“我们是在涛声里作爱。”

那几天过得特别快，小冯庆幸自己才到法国不久便碰上了好人，而且是法国人，接下来顺理成章的便是结婚、拿法国籍、回中国看望父母。她在编织这一切美好的时候，除了这法国男人的身体，其余如职业、婚否等等一概不知，她想她应该问一问。

法国男人很潇洒地喝一口红葡萄酒，“你知道，冯，如今的法国男人和女人一般都不想结婚。”

“为什么呢？”小冯不解地问。

显然这位法国男士猎获过不少中国姑娘，他多

少了解一点中国：“你们中国人很难理解，这是文化的差异，我们法国人喜欢自由、悠闲。有了一个家生两个孩子，你怎么悠闲？你怎么自由？中国人不是这样，一家一户的把人的天性都扼杀在婚姻的束缚中，要不你们中国为什么那么穷？为什么都想往国外跑？”

回到巴黎后，他留给小冯一个录音电话的号码，也就是说，只要这个法国男人需要，随时都可以找到小冯，而小冯却什么时候都找不到他。

那是一场由时装、假首饰、风情包装的恶梦，留在英吉利海峡诺曼底的沙滩上，早晨的潮水卷着的茫茫的雪浪花冲来，还不如一粒粒卵石，真实的存在。人类的防线如此软弱无力！

攻读心理学博士的一个中国留学生把小冯的病态诊断为“度假狂想症”。

一种强刺激之后的后遗症、失落感。

在自身无法平衡的情况下，通常表现为：

沉缅于昨天。

把今天当作昨天。

愈是子虚乌有的在她看来愈加实在且放出光彩，有斑斓的吸引力。

如同逛过一次赌场粉碎了发财梦的人一样，总是想把失去的钱赢回来，当他没有能力去的时候，就会狂想，他甚至把整个人生的舞台都看作是赌场，政客的赌场，商人的赌场，口号、旗帜、标语同广告牌同赌场的筹码有什么区别？

有疯子在巴黎的大街上边跑边喊：“投机商创造了吃饺子老虎机，政治家发明了轮盘赌！”

“度假狂想症”的病源是：孤独。

1980年6月，加拿大人盖尔坦·杜加斯走进美国旧金山的一家医院，他只是为了割除脸部那个小小的紫色的疣子，他的恋人很不喜欢他那个纯属多余的疣子，他实在没有想到他那紫色的疣子使他成为人类有记载的世纪瘟疫——艾滋病的第一号患者。

艾滋病最先光顾西方，横行欧美，这是不是偶然？

人类最富有的一些地域，最繁华的一些都市，正在成为毒品和艾滋病的集散地，这已经不是秘密。就在人们继续疯狂地追求富有和繁华的同时，无处不在的孤独，也像迷雾一般更加浓重地笼罩着西方；而通过各种渠道来到海外的中国人，几乎无一例外地已经、正在或将要经历西方的孤独的煎熬。

她的出国可说是富丽堂皇的了。